

南岳游干班是国共两党共同培养抗日游击干部的摇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果,在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期国学讲座上,市委党校教师任蓉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精彩解读——

三千游击干部从这里走上抗日战场

■本报记者 许珂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曾两次合作,共同培养军事人才:第一次是1925年在广州共同创办了黄埔军校,第二次是1939年在衡阳共同创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近日,市委党校教师任蓉做客国学讲座,对南岳游干班这段历史进行了精彩解读。

办游干班是取共产党之长、补国民党之短

抗战之初,日军以强大攻势侵入,我方游击战受到限制。但是,在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后,战线不断延长,兵力分散不足,无暇顾及后方的大片区域,这正适合我方开展游击战。

当时的战争局势使国共两党都意识到游击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文章,对游击战作了精辟的论述:“大半个中国将要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也开始意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蒋介石曾言:“吾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之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

同时,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鲜明对比,使单一硬拼的正规战与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之间的优劣一目了然,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陷落,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调动200多万军队以城市为中心打阵地战,虽然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但是付出了惨重代价。正面战场伤亡人数高达110万余人,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徐州、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先后失守,半壁江山沦入敌手,抗战形势异常严峻。而与此同时,在敌后战场上,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分散向华北、华中的敌后挺进,坚持“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另一方面深入敌占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短短一年多时间,部队就由原来的5万余人发展到17万余人,先后建立了华北的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晋西南、冀鲁边、大青山、山东和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广泛的抗日根据地,人口达500万以上,在敌后战场牢牢站稳了脚跟。

所以,上海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之前正面拼消耗

的战略,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新战略,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那么,为什么是国共两党合作办学呢?因为,国民党缺乏游击战的思想 and 实践,必须借助共产党的游击战理论和游击战人才,合作办学是取长补短的必然选择。

当时游击战还是一种新战术,没有成熟的、固定的方式,因此游击战的教育工作也没有一个准绳。对于国民党而言,向来习惯正规战、阵地战,对游击战则比较陌生、比较外行,缺乏成熟的游击战思想,游击战实践也不成功,单独办学的困难较大。

而共产党则是游击战的行家,从土地革命开始的十余年革命战争中,已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游击战理论,并在敌后战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游击战争。基于抗战需要,共产党必须广泛宣传自己的游击战理论、战略、战术,也真心愿意帮助国民党办班培养游击人才。所以,不论是从游击战的理论经验而言,还是从合作诚意而言,共产党都是最佳的合作伙伴,国共合办南岳游干班是取共产党之长、补国民党之短的必然选择。

国共合办游干班培养游击干部3000余名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侵华策略: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 进行疯狂的军事“扫荡”;在沦陷区积极扶持汉奸政权,加强经济掠夺和政治奴役,以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

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这一企图,适应第二期抗战的需要,蒋介石于1938年11月25日至27日在南岳衡山的圣经学校召开第一次南岳最高军事会议,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并决定在南岳创办游干班,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培养游击战骨干。中共中央经过全面研究,决定组成一个30多人的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

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干班宣告成立,全称是“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

不久,国民党军委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以军事训练机构应隶属军训部为由,报经蒋介石批准,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改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后来,因为在西安新设了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又更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



西南班”。

游干班原本选址在长沙,但是长沙因为文夕大火而难以承办,后来拟定选址在衡阳,又因衡阳是交通枢纽日机轰炸厉害而存在风险,最后决定在衡阳南岳镇开办,班本部则设在南岳的圣经学校。

南岳游干班的学员来源有四个方面:各战区部队选送的校级和尉级军官,各省政府、县政府以及各级国民党党部选送的党政人员,三民主义青年团部保送的人员,从衡山、衡阳、曲江、桂林、吉安等地直接招考的部分高中毕业生。学员的军衔大部分为少校,一部分为上校、中校、上尉。其中,第一期学员主要是各战区部队的军官,大部分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一部分为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以及其他地方军校的毕业生。

南岳游干班的教育训练实行精神、政治、军事并重,精神教育以总理遗教、领袖言行为主;政治教育以党团训运用、民众运动及游击政工为主;军事教育以游击战术、游击战事及爆破技术为主,共开设了24门课程。虽然课程多而且比较繁杂,但以游击战争课为中心,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游击战争概论、游击战理论基础、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教育、游击战的破坏作用、游击队的通讯术和游击战的化装术、情报原理、游击战术实习。

同时,游干班还邀请了一些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来讲学,如:苏联顾问讲授炮兵、步兵协同作战;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讲授“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蒋介石讲授“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白崇禧讲授“关于游击战的问题”;陈诚讲授“论游击战”;周恩来讲授“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胡愈之讲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这些讲学鼓舞了学员们的斗志,提高了对游击战争和敌我形势的认识,增强了持久抗战的意志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国共两党合办南岳游干班的前三期,共培养了3035名游击干部。1940年夏,国民党单独办第四期,因遭敌机轰炸而转移到湖南邵阳结业,第五期在江西修水举办,第六期又迁回湖南邵阳,第七期则转移到浙江丽水,游干班到此全部结束。

共产党扩大了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

合作南岳游干班,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因为,一方面,在抗战形势异常严峻之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民党还不忘加快反共步伐,但是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愿意放下党派嫌隙,与国民党合作开办南岳游干班,把游击战的精髓传授给国民党将士,展现出共产党的民族气节和政治格局,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扩大了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

另一方面,让国民党将士看到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真诚合作的态度、倾囊相授的胸怀、苦干守纪的作风,消除了国民党学员对共产党的误会和成见,扩大了共产党在国民党队伍中的影响。许多国民党军官和叶剑英以及中共代表团接触后,才真正了解共产党,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思想上对中共有了很大的转变。许多学员结业后,与八路军、新四军建立了联系,配合作战、并肩战斗。还有一些学员直接找中共代表团,要求到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游击队中去工作,有的历经千辛万苦、几经辗转,脱离了国民党部队,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期间,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一直在矛盾和摩擦中坚持合作办学。始终顾全大局,这是我党最清醒的生命力源泉。

如,在游干班开学前,国民党当局曾“约法三章”,规定国共双方不得在游干班里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代表团严格遵守约定,而国民党方面却要求全体学员加入三青团或国民党,对不愿入的则怀疑是“异党分子”,最后中共学员以大局为重加入了三青团或国民党。

又如,南岳游干班从第二期开始,矛盾和摩擦逐渐加剧、升级。但中共代表团和游干班里的共产党学员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处以大局为重,同顽固势力展开斗争,坚持合作办学。还有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暗中监视中共人员,尤其对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的学员很不放心,对一些比较活跃的队员进行拉拢、威胁,甚至关押。

再如,在南岳游干班授课时,叶剑英提出了“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的著名论点,强调游击战最大特点就是广泛的民众性。叶剑英深入浅出地道明了群众路线的真谛,让学员们意识到完全依靠国内精英阶层难以取得抗战胜利,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才是最强劲的抗战力量。以前习惯于片面抗战、脱离群众的国民党将士为之 一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的“接地气”冲击了国民党自以为是的“高大上”。

朱炳如：为官清廉刚直,重视地方教育

朱炳如（1513年—?），字稚文，又字仲南，别号白野。明代湖广衡阳县人，原籍汝城，祖父任衡而居衡。朱炳如从小就因为有文才而知名，太守蔡汝楠、胡安都视他为上宾，但朱炳如从不是为了入仕而去拜访他们。李月崖代桂阳太守政事的时候，曾要捐助他百金，却被他拒绝了。直到他四十六岁，才考上进士，历任行人、御史、泉州知府、两浙盐运使、浙江按察使、陕西布政使等职。

朱炳如为官清廉谨慎，敢于直言极谏，他奉命出使藩府时，地方上的馈赠一概不予收受；去地方赴任时也从不讲究排场，常常一人一骑进城，随行的仅仅只有两箱图书、几套官服而已。

他不仅为官清廉刚直，还十分重视地方教育。他在

担任泉州知府的时候，处理完行政事务后，常常召集文人学子一起研究学问，一整天都不感到疲倦。泉州学子参加庚午年科举考试，中试者竟然高达58人，其中有两 人分别在福建考区及京城考区考中解元。泉州学子因此对朱炳如感恩戴德，纷纷出资建朱公生祠以纪念之。

朱炳如著有《白野诗文集》刊行于世，《湖南文征》收录其奏疏一篇。他约卒于明万历年间，葬于衡阳城西十里渔子铺（即今衡阳市蒸湘区长湖乡境内）。

（本报记者翟瑜根据市志办提供的资料整理）

衡阳历史文化小辞典

人物系列 15

经典品读

《周易》中的君子形象

文/ 王 强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排序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顺序。

其次是君子重时。时，是时机。对常人而言，它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时刻，而对君子来说，它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机。《彖传》中十八次提到“时”，可见“时”之义大矣哉，也足见周易对“时”的观念和意义的注重。“时”义第一次出现在《乾·彖传》中：“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古经中的君子更是有能在不利和险境的情形下，把握时机，扭转时局。《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济之时，天下本太平无事，然而九三是以阳爻居阳位，阳气旺盛，可大有作为，所以有“高宗伐鬼方”这样的征伐之事发生。但“三多凶”（《系辞下传》），又处下卦之极，上卦为坎，则险陷在前。这个时候，连圣明的殷高宗征伐一个异族，尚且三年才能克之。若是小人，不能辨势时议，还要乘势而上，那是非常危险的。

再者是君子尚中。大家都知道“中庸”思想属于儒家，属于孔子。其实，在《周易》古经中早就有了。《周易》六十四卦都是由两个八卦构成的，八卦由三画构成。两个八卦中间那爻，即二爻和五爻，就是一个六画卦的中位，是最吉利的位置。即使整个卦显示出艰难困顿的不利之义，二爻和五爻也会因居中而获得转机。

（据《光明日报》）

国学荐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家风传承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